

薛福成

丁凤麟
张道贵 著

江苏历史人物小丛书



薛福成

丁凤麟

张道贵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薛 福 成

丁凤麟 张道贵著

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
(原江苏人民版)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3.12 插页 2 字数 50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4501 - 10100 册

书号: 11354·035 定价: 0.50 元

责任编辑 王士君



薛 福 成 像

目 录

一、发愤读书.....	1
二、栖身曾幕.....	9
三、名满都下.....	18
四、转投北洋.....	23
五、倡导变法.....	32
六、筹防浙东.....	41
七、入京陛见.....	57
八、出使四国.....	62
九、察其利病.....	68
十、关念侨胞.....	83
十一、维护主权.....	90
十二、病逝行台.....	98

一、发愤读书

大清同治四年(1865年)盛夏的一个深夜,一艘宽敞的官船,停泊在江苏宝应附近的大运河上。四周雨声淅沥,流水潺潺,不时传来阵阵蛙鸣虫叫之声,可官船中舱,仍然灯火通明,寂静异常。奉命由南京率军北上“剿捻”的钦差大臣曾国藩,正在伏案翻阅各地士子应招呈递的“万言书”。翻着,翻着,他双眉紧锁,呵气一个接着一个,神情颇为沮丧。原来,已看过的一厚叠,竟没有一份能引起这位“中堂大人”的注目。他不介意地随手捡起案几上的最后一份,打算草草翻阅一下便上床就寝。岂料,不翻犹可,一翻开这份不寻常的“万言书”,曾国藩的目光,好似针尖碰上磁铁般的,被深深吸引住了。他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读了下去……

“养人才,广垦田,兴屯政,治捻寇,澄吏治,厚民生,筹海防,挽时变。虽其间草野臆度之言不乏,而论当今要务,似不外是。言辞芜拙,字迹粗劣,伏惟恕而察之,不胜惶悚冒昧之至。……”工整的小楷,畅达的文笔,尤其是作者独特的见

地和开阔的视野，映在曾国藩的眼帘，似乎使他服了一帖兴奋剂，顿时驱散了浓重的睡意。他再次剪去案头上的烛煤，把这份引人瞩目的“万言书”摊在案上，再仔细诵读一遍。只觉得，通篇宏议郁发，灏气孤行，朴茂神味，洋溢其间，真可谓古文家无此宏迈，策论家无此精深。曾国藩一阵高兴之后，便对左右说：“吾此行得一学人，他日当有造就！”^①这个使曾国藩为之倾倒的人物，便是在曾国藩面前自称“门下晚生”的薛福成，也就是日后驰名中外的杰出政论家薛福成。

薛福成，字叔耘，号庸庵，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（1838年4月12日），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。薛氏祖祖辈辈虽则嗜书如命，苦读寒窗，然而在科场上却很不走运。薛福成的曾祖薛世琛，终生是个未入庠的老童生。祖父薛锦堂，虽然学识根底并不浅，一生也只考上个秀才，称为“府学生”，仍算布衣。其父薛湘，起初也是个依靠教授蒙童养家活口的一介书生，后来苦读中举，充任官学教谕，使寒素的门庭稍有转机，直到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才侥幸考中恩科进士，被委派到镇江当个府学教授，算是真正踏上了仕途。

^①薛福成：《庸庵文外编》卷三。

同父亲相比，薛福成对母亲的情感更为深厚。母亲顾氏，出身于无锡县西溪乡的一个名门望族，“先世自元明以来居无锡为望族”。顾氏之父曾为国子监生。但顾氏五岁时，父亲不幸亡故，家道中落，孤女寡母，“作苦茹澹，衣食仅自给”^①。顾氏从十八岁嫁到薛家后，扶老赡幼，孝事翁姑，是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。由于薛家清寒，丈夫又常常在外橐笔宦游，她只身挑起家务重担，平时不但“佐以女红”，靠十指收入贴补家用，还得负责对六子一女的教养。她对子女的教育，十分认真严谨，每天晚上，总得亲自督促薛福成兄弟们努力阅读功课，“教诫不少倦”。每当寒暑风雨之夕，她常对子女们娓娓不倦地讲述，某人家的孩儿，由于读书用功刻苦，终于“身享令名，荣及父母”；某人家的子孙，由于不爱念书，结果“污贱危辱，濒于死亡”。这类正反两方面的劝诫，虽然只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封建说教，但出诸慈母之口，却深深拨动着薛福成幼稚的心灵，每每使他“耸听汗下，罔敢自逸”^②，于是，他发愤读书，矢志按照父祖辈的老路塑造自己，钻研八股，苦读经书，不至夜半，决不罢休。

但是，严酷的社会现实，又给薛福成的成长道路

①②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编》卷三《先妣事略》。

带来新的影响。咸丰元年(1851年),正当少年薛福成埋首于四书五经和八股章句之间,风雷激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。起义烈火立即燃遍了大江南北。这时的大清王朝,早已从康乾“盛世”的顶端跌落下来,江河日下,步履维艰;更兼鸦片战争的袭击,使之愈加内外交困,百弊丛生,国内哀鸿遍野,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。

这风狂雨骤的“乱世”,刺激着当时的有识之士,重新思考祖国的前途;也使十三、四岁的薛福成,开始对“专以八股六韵,徒事空谈,抛弃事实”的科举道路,产生了疑问。他试探着改弦易辙,“慨然欲为经世实学,以备国家一日之用。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”,不按八股致仕的科举旧道向前爬行,开始沿着前辈龚自珍、魏源所倡导的“经世致用”的方向摸索前进,决心使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。

为了实现“经世致用”的抱负,薛福成抛弃那些空洞乏味的时文,不再拘泥于八股章句,悉心致力于“经世实学”,博览群书,总结历代王朝成败兴亡之教训,上自天文,下至地理,旁及陆王“心学”,乃至阴阳、卜筮,无不专心研究。在刻苦攻读的过程中,他很注意同弟兄们“风雨一灯”,享受“群聚讲习之乐”^①,

①薛福成:《庸庵文编》卷三《季弟遗集序》。

彼此相互切磋辩难，取长补短。在弟兄六人中间，排行第三的福成和年岁相近的四弟福保，手足情谊，更加深厚，“自髫髻以至成人，读书同塾，应试同时”^①。起初，四弟好攻古文辞，覃思不辍，兴趣极浓。薛福成对此不以为然，曾诘问四弟说：“而今世态变化异常剧烈，士子不论遭遇如何，总该追求对现实有助益的经世实学，以见称于当世。你何必一味钻研文艺这门末技呢？”四弟“外讷而中莹”，平时不善言词，但听到这话，却极为明快地回答说：“不然。文与道是相辅相成的。自古以来那些称名于世、遗泽后代的伟人，不会写文章就难以成功。你看，贾谊、董仲舒、诸葛亮、陆贽，都能写出一手很漂亮的文章，这些大贤所以能斡旋世运，名垂青史，还不就是靠了文章的力量吗？！怎能对它这般轻视呢！”^②此番答问，可谓各有千秋，兄弟俩都受到了启发。从这以后，四弟开始注重对经世实学的钻研，凡薛福成读过的书，无不认真阅览，后随薛福成进入曾国藩幕府，磨炼多年，最终成为丁宝桢的左右手，“为掌笈奏以佐之”^③，以学博行高饮誉当时；薛福成也在古文辞上狠下了一番功夫，练就一手超群的古体散文，不但称名当世，对他日后事业

①薛福成：《庸庵文外编》卷四《祭季弟文》。

②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编》卷三《季弟遗集序》。

③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续编》卷下《母季弟怀事状》。

的造就，更有莫大裨益。

当然，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。薛福成十七岁那年，大哥薛福辰在顺天乡试中了第二名举人，声名大振，还当上了工部员外郎。大哥的少年得志，又激起薛福成沿科举之路猎取功名的愿望。一八五八年春天，他同四弟一起参加了无锡县的童生考试。虽然考生众多，学额有限，在那一千多名的考生中，只能有三十名中秀才。但他俩以杰出才华被拔取，同补县学生，踏上了科举道路的第一层阶梯。当年夏天，英姿勃勃的新秀才薛福成，陪同大哥赴湖南探望父亲薛湘。不料，在湖南担任县令的薛湘，因在对抗太平军中不遗余力，多年积劳成疾，刚接到擢升浔州知府的命令，便于盛夏七月一命归天。一八六〇年春，薛福成兄弟俩办完父亲丧事及善后事宜返回故乡。此时，又值太平军挥戈东征苏常地区，无锡的薛氏家族受到战火冲击，薛福成家的产业也荡然无存，母亲只得带领家小离乡避乱，辗转苏北。薛福成兄弟有家难归，于是“航海涉江”，几经周折，方在苏北宝应的东乡，找到了离散的亲人，开始了侨居他乡的生活。

侨居宝应的薛福成，心情是复杂的。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百感交集”。这是因为，作为官宦子弟，他对农民起义造成的“田庐毁废，亲故凋亡”，对“母老家贫”“转徙异乡”的不幸结局，怀着本能的阶级仇恨，于

是，在痛心疾首之余，曾经积极筹划敌视太平军的“灭贼方略”，准备向朝廷献策；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学子，目睹当时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再次惨败，更使他怵目惊心，闭门读书之余，不能不考虑，如何弥补外国侵略者为祖国造成的深重灾难。

于是，为了实现“匡时济世”的宏大抱负，薛福成更加刻苦地研读“经世实学”，注意了解民间疾苦，考察社会积弊，构思着拯救祖国的蓝图。如今，鸦片战争虽然已过去了十余年，但对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一事，尤其是对林则徐耿介不阿的坚强性格和“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”的爱国主义情操，他深为钦佩；而对软骨头琦善、穆彰阿之类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，更是义愤填膺，时加痛斥。茶余饭后，薛福成常爱对人讲述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：

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后，大学士王文恪（王鼎）深为不平，每次上朝遇到穆彰阿时，就指着穆彰阿的鼻子，骂他是秦桧、严嵩。但是，道光皇帝根本听不进人们对他宠爱的首席军机大臣的纷纷谴责，反而更加器重穆彰阿。为此，耿直的王文恪仿效史鱼尸谏之义，自缢身亡，以自己的死，抗议朝廷的不公正。后来，在王文恪祠庙的上空，经常回荡着发自千百万人们胸臆的正义呼声——“林则徐！”
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经过讲述者加工渲染的传闻故事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青年薛福成的强烈爱憎。他多么企望自己有朝一日，能步着林文忠公的后尘，在这“千古未有之奇变”的非常时期，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赤诚，为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，施展一番“经世致用”的本领呵！

二、栖身曾幕

薛福成的时代条件和本人资历，虽然同当年的林则徐有着很大区别，但是，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，也为有志者薛福成提供了施展才智的机会。

二十六岁那年，薛福成终于得到机缘，被正式卷入政治旋涡。然而，等待着他的却是充当洋务派的幕僚。前面提到，一八六五年夏天，清军将领僧格林沁被农民起义队伍捻军击毙后，清廷惊恐万状，即刻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北上，主持“剿捻”事宜。曾国藩奉旨北上“剿捻”途中，沿途张榜郡县，招致贤才。座船行至江苏宝应时，曾国藩见到薛福成洋洋万言的《上曾侯相书》，不禁拍案叫绝。旋即派人将薛福成召来晤谈。言谈间，曾国藩目睹这位自称“门下晚生”的青年学子举止端庄，谈吐不凡，不但晓于国家大事，且国学根底深厚，是个难得的“经世”之才，当场要薛福成留下，充当他的幕僚，颇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。当晚，曾国藩在日记中郑重记下：“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，递条陈约万余言，阅毕，嘉赏无已。”^①

^①薛福成：《庸庵文外编》卷三。

薛福成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权势显赫的达官权贵，且又对自己如此器重，便满口答应，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曾国藩幕下客的生涯。

这样，曾国藩的戎幕中，又增添了一名参与机要的随员。薛福成同比他早进曾幕的向师棣、黎庶昌等人一起，共同辅佐并筹划曾国藩镇压农民运动。在此期间，薛福成追随曾国藩北驻徐州、移师济宁、奔赴河南，在“剿捻”过程中，登泰山、跨黄河，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，更了解到中原地区的政俗民情；曾国藩因“剿捻”无能，被清廷罢斥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后，薛福成又跟随南返，栖居南京两江总督衙门。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忽逢秋闱大比。薛福成这位“进学”已近十年的秀才，虽曾痛斥过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，但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群中的一员，不愿放弃这一中举机会。可是，经过“乡试”，薛福成只中了一名不能进京参加会试的“副贡生”。这次科场失意，彻底打消了薛福成沿着科举“正途”向上高升的幻想。此后，他便戴着“副贡生”这顶最高功名，决心沿着充当幕僚这条“他途”，向前闯荡，曲折地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薛福成同曾国藩的师承关系愈来愈深，几乎朝夕相从。曾国藩酷爱下围棋，每日清晨，都要请嗜好相同的薛福成与之对弈。不但切磋棋艺，更注重交流对诸如“兵事、饷事、吏事、文事”等

项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。

一日清晨，曾国藩、薛福成吃罢早点，照例又在庭园里摆开阵势，下起围棋来了。刚开局不久，曾国藩就向薛福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我大清王朝总是遭致泰西各国之侵侮？”素来镇静的薛福成，慢悠悠地提起茶杯，呷了一口浓茶，沉思片刻，答道：“大帅！西人初次与我大清王朝打交道时，尚未摸清我们的实际情况，往往被我们‘夜郎自大’的神态所吓倒，故不敢轻举妄动。自从鸦片战争之后，西人看清楚了我们大清的种种举措，忽而罢兵弛禁，且偿其货以骄之，继而倏战倏和，茫无成议，以致战则丧师，和则辱国，于是中国之实情，历历在西人之目；这样一来，西人得寸进尺，贪得无厌，向我索地索币之师，纷然狎至，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了。这就是我大清王朝总是遭受邻国不断侵侮之原因。”薛福成抓住清王朝的昏聩腐朽和虚骄，来剖析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原因，还是击中时弊的。惯以忠于大清王朝自诩的曾国藩，听到这些不满于朝廷现状的直言，颇有点坐立不安，但对僚属当面向自己陈述其肺腑之言，也不无称许之意。于是，他在用汗巾抹去冷汗后，外表上强作镇静，对着薛福成连连点头，并再追问一句：

“那么，依子之见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听到这么一问，薛福成神态显得激动起来，索性

离开座椅，向曾国藩陈述了自己几年来“渊渊夜思”的救国大计。

“大帅！尔今面临的是中华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变。我大清王朝切不可等闲坐视，再不能夜郎自大，闭关自守了。应该学习西方，夺其所长，避其所短，不能一谈到洋枪、洋炮、火车、轮船，就谈虎色变，瞠目束手，拒之千里之外，甘愿受强敌之侵侮。为今之计，应该引进洋人的先进技术，力求自强，决不能再抱残守缺，一味死捧着经书了！”

薛福成这番议论，是有强烈感染力的。虽然不可能唤醒这位位至“上相”的清廷大僚去实心“照办”，付诸实施。但平心而论，薛福成所阐发的比当年林则徐、魏源等人更为具体的学习西方长技的意见，对正在热衷于倡导“洋务”的曾国藩，还是起着一定的影响，至少促进这位炙手可热的达官权贵抬起头来去看看西方，对洋人再采取“以扇遮面”的老一套办法，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了。当然，在洋务运动中，曾国藩等人站在“力保和局”的立场上，对侵略者处处忍辱退让，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“制民”，这与薛福成提倡的向西方学习的初衷有着原则的区别。薛福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，继承林则徐等先驱的爱国立场，较有系统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正确主张，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进步。